

严复先生
翻译名著丛刊

A History of Policies
Edward Jenks

社会通论

〔英〕爱德华·甄克斯 著
严复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014034019

D03
56

【台湾商务印书馆百年汉译名著】

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

A History of Politics
Edward Jenks

社会通论

〔英〕爱德华·甄克斯 著
严复 译



北航

C1722182

D03
56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通论 / (英)甄克斯著; 严复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3

(严复翻译名著丛刊)

ISBN 978-7-80769-172-3

I. ①社… II. ①甄… ②严… III. ①国家理论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3019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社会通论

(英国)爱德华·甄克斯 著 严复 译

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 选题策划 武 学

责任编辑 武 学 张艳玲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 89592120

规 格 695mm×995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42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172-3

定 价 48.00元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戊戌变法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几年里，集中翻译了《天演论》、《名学浅说》、《原富》、《法意》、《社会通论》、《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群学肄言》八部巨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集中再版，“严译名著丛刊”从此得名。1981年，商务印书馆再次校勘重印这套丛刊。

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65年和2009年两次重印《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本社出版的这套丛刊即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

本套丛书收录了严复先生嫡孙严倬云为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重印《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所做《序》，同时收录《严复先生与商务印书馆》，详细地介绍了严复先生一生救国救民的思想以及他的主要译述生涯，能够很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严复翻译著作。

此次引进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在编排体例上做了较大改动，一是根据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原版繁体字转为简体字，竖排转为横排，标点和字词用法则保留台湾商务印书馆版本原貌；二是对版本进行了校勘，更正了若干明显的错讹；三是将中西译名对照和注文与内文进行了核对。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先生一生译述、著述颇丰，除了上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种译述外，还翻译了德国人卫西琴《中国教育议》、英国人密克《支那教案论》、英国人狄仑《论今战财政》三部

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先生又根据当时外国报纸翻译整理编为《欧战缘起》，发表在1915年的《居仁日览》上。在1904年前后，严复先生还亲自编撰了一本英文语法书，用文言讲英文语法，而且在编排上是左起横排，开了横排风气之先。同时这本书也是我国最早使用西式标点的著作。这就是《英文汉诂》。

此次我们出版这套《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除了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八部巨著外，增加了这五种著作。而这五种著作，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可以说，我们出版的这套严复先生译作集是目前所见最集中最全的版本，其版本价值显而易见。

以下是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严复八种译作的书名，与现在流行的版本书名对照：

法意（论法的精神）

Spirit of Laws

名学浅说（逻辑学教程）

Primer of Logic

穆勒名学（逻辑学体系）

A System of Logic

群己权界论（论自由）

On Liberty

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社会通论（政治史）

A History of Politics

天演论（进化与伦理）

Evolution and Ethics

原富（国富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救亡图存，富国利民

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序

祖父严几道先生，身当清末衰颓之世，首先有系统的把西方的观念和学说引进中国，因为他看到了中国面对的危机，必须救亡图存，全盘维新。祖父的一生，他的所学、所思、所为，离不了忧国之心，爱国之情。

祖父译述之西方名著，包括《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论》、《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八部巨著，原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称“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绝版已久。现台湾商务印书馆决定重新编排发行这八本书，以飨读者。嘱我为序，谨识数语，以表我对祖父的思慕。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败，给祖父的刺激最深，当年十月他给长子严璩的书信中痛心的说，清廷“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国事败坏至此，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他接着在

一八九五年发表了四篇充满血泪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救亡决论”，提出中国振衰起敝的办法，强调必须认清中国人自己的缺点，吸收西方的优点，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再造富强，所以有学者认为严复是清末维新运动中一位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言论家，诚可信也。

祖父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对时代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企盼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他服膺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所以他的“辟韩”论，驳斥韩愈“原道”中所谓“君者，出令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他说韩愈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人民。祖父希望发扬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民主概念，以“新民德”，而臻富强。

祖父一生，处于国力积弱、战乱频仍的时代，在政治上难以发挥，转而引介西方学术思潮，从事中西文化的整合与重建工作，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祖父的译述工作，提出了“信、达、雅”之说，用力甚勤，故梁启超曾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清末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也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又说：“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今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祖父译书八本，当可印证其历久常新也！

祖父翻译西方名著，重在思想之传播，而非仅仅文字之传译，

他认为“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物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所以他在译书中也会表达自己验证的意见，希望真正做到富国利民，以达不朽。

严倬云 谨识

严复先生与商务印书馆

一九二〇年代以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创馆元老张元济的主导下，出版了许多介绍外国新知识的翻译书，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严复译介英国学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翻译《天演论》，影响深远

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一八三一年乘坐小猎犬号探险船环球旅行五年，搜集有关物种进化的证据。回到英国后，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加以研究整理，到一八五六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九年出版《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提出物种进化的证据，引起学术界和宗教界一片哗然。

赫胥黎本来是反对物种进化理论的，当他看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后，恍然大悟，从此非常积极支持进化理论，甚至于

一八六〇年在牛津大学讲堂，与威博佛斯大主教（Bishop Samuel Wilberforce）公开辩论，威博佛斯讥笑赫胥黎的祖父母是否来自哪一个猿猴？

赫胥黎从此努力研究进化论，甚至提出人类进化的证据，证明猿猴与人类的大脑构造是相同的。他把有关的研究写了许多本书，其中《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是讨论有关进化的伦理问题，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理论，于一八九三年出版。

留学英国，译介西方名著

严复于一八五四年阳历一月八日在福州出生，家中世代以中医为业。十三岁丧父，遂放弃科举之途，十四岁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四年后成为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分发给“建威舰”、“扬武舰”实习五年。

一八七二年，他取得选用道员的资格（正四品，可以担任地方主官），乃改名严复，字几道，于一八七七年三月前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学习。两年后学成返国，在他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翌年升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一八九〇年升为总办（校长），但与李鸿章意见不合，有意另谋发展，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开始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主张变法维新。

一八九六年，张元济进入总理衙门服务，开始勤读英文，认

识了严复。次年，在严复的协助下，张元济创办西学堂（后改名通译学堂），传授外国语文，聘请严复的侄儿严君潜担任常驻教习。这一年（一八九七年），严复与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扬变法维新以图存的主张，并开始连载刊登他所翻译的《进化与伦理》，改名为《天演论》，介绍西方最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

一九〇五年《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在自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可见严复翻译此书，正是要引介外国新潮流来启发国人。

一八九八年，张元济与严复都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谈到变法维新的问题。可惜百日维新在九月二十一日随着“戊戌政变”而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录用，当年底回到上海，次年获聘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梁启超从天津搭船逃往日本，“国闻报”因为详细刊登政变经过而被查封停办。

商务出版《原富》等世界名著

一八九九年六月，严复将他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寄给张元济，南洋公学决定以二千两银子购买版权，严复同意，一九〇一年由南洋公学分册出版。后来因为版税没有正常给付，严复再将《原富》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起，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正气会发起成立的中国议会，容闳被选为会长，严复被推举为副会长。

张元济在一九〇二年为商务印书馆创设编译所后，出版了很多本严复翻译的书，除了《天演论》、《国富论》外，还有《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2, 商务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群己权界论》（John Mill, *On Liberty*, 1859, 商务在一九一七年购得版权）、《穆勒名学》（John Mill, *A System of Logic*, 1843, 商务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社会通论》（Edward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 商务在一九〇三年出版）、《孟德斯鸠法意》（Montesquieu, *Spirit of Law*, 1750 Thomas Nugent 英译本，商务一九〇六年出版）、《名学浅说》（William Stanley Jevons, *Primer of Logic*, 1863, 商务一九〇九年出版）。（《勇往向前——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台湾商务出版）

《穆勒名学》上半部在一九〇五年由南京金粟斋木刻出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张元济购得版权，并请严复继续把书译完。

商务印书馆也曾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严复编写的《英文汉诂》（英汉辞典），提供读者另一本研读英文的工具书。

《天演论》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销行很广，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本书共印行了三十二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刺激与影响（刘学礼，《达尔文学说在近代中国》）。后来马君武等人也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翻译出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台刊行北京商务印书馆新译的《物种原始》，列入

OPEN 系列。《天演论》在台湾仍然一再发行。

严复在一九一〇年曾获宣统皇帝赐予文科进士出身，并担任海军部协都统、资政院议员。一九一二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担任首任校长，但到十一月间即辞去校长职务，次年担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一九一四年曾担任参政院议员，参与宪法起草工作。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严复避祸于天津。一九二〇年气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严复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致力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商务印书馆全力协助出版，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所翻译的书，提倡“信雅达”，以半文言写作，至今仍然流传在世。

台湾商务印书馆自九十七年（二〇〇八年）起，推动台湾商务的文化复兴运动，要将商务历年出版或已绝版的知识好书，重新增修编辑发行。“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的重新编辑出版，正是为了推介严复当年翻译西方文化名著的成就，同时也希望新一代的读者能够重新阅读世界文化名著，共同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文化复兴。

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王学哲

总编辑 方鹏程谨序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例言

- 一 严几道先生所译各书，向由本馆出版，久已风行海内，兹特重加排印，汇成一套，并将严先生之译著，向由他处出版者，亦征得原出版处同意，一律加入，以臻完备。并精校精印，版式一律，既易购置，尤便收藏。
- 二 本丛刊共分八种，乃辑合严先生所翻译之著作而成，至严先生之著作，不属于译本之内者均未辑入。
- 三 严先生之译名，为力求典雅，故多为读者所不能明了，且与近日流行之译名不尽同；本丛刊在每册之末，均附有译名对照表，一面将原文列出，一面将近日流行之名词，附列于后，使读者易于明了。
- 四 凡书中所引之人名地名，均分别注明，以便读者易于查考。
- 五 书中各名词之用音译者，则将其原文引出，以便读者知其音译之本字为何。

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僭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

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繙厄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厄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彳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鄙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嚶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槊。辛苦逡译之本心矣。